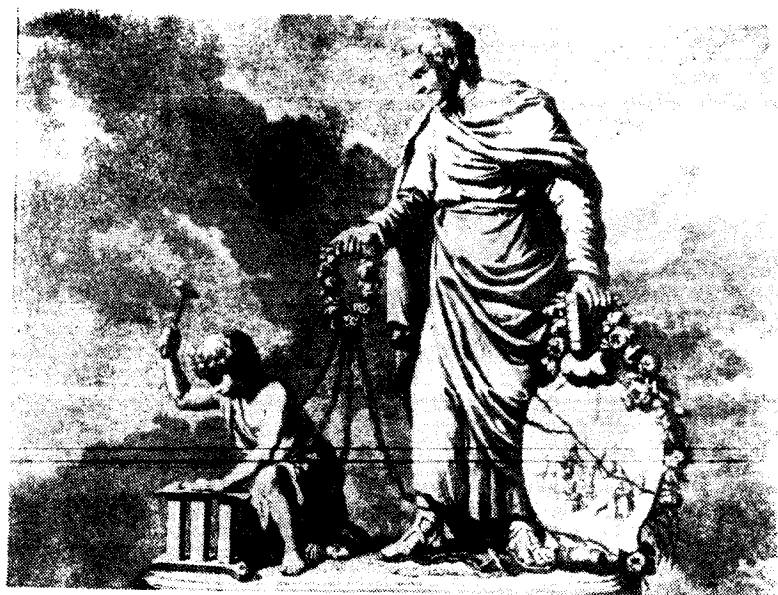


建立在瑞士日内瓦城的卢梭纪念碑



（说明：卢梭左手所按的系旧教育摧残儿童的景象，右手所持的是他要儿童砸开的镣铐。）

见 Frederick Eby 和 Charles Flinn Arrowood 合著《近代教育史》(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 1945 年版书首。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出版说明

为了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不仅需要研究我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总结我国教育的经验，而且需要研究外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借鉴外国教育的经验。为了给我国教育工作者提供研究外国教育思想的理论著作，并给师范院校提供教学参考书，我社决定出版这套丛书。

这套丛书选收古代、近代、现代对世界、对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外国教育家、心理学家的有代表性的教育理论著作，包括整本专著、文章汇编或者著作节选。

毋庸置疑，本丛书所收选的书既闪耀着人类教育智慧的光辉，又由于作者所处时代、阶级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糟粕；有的虽非糟粕，但由于地区条件的不同，也可能并不适合于我国。因此，我们在阅读时一定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武器，对书中的内容进行分析，批判地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而不要照搬照抄。

为了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书的内容，我们请译者或有关专家为每一本书撰写了前言，有的书还附有年表、图片或其他参考资料。当然，前言只是一家之言，而不是对某书的定评；读者完全可以对这本书进行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研究。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本丛书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我们改进工作。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

卢梭和他的《爱弥儿》

本文先介绍《爱弥儿》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生平，再介绍《爱弥儿》的重要论点和历史贡献。错谬之处，敬请读者教正。

(一)

卢梭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者，是近代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家。他的政治理论给法国大革命作了先导，对美国独立和世界人民谋求自由解放的斗争，给予了有力的推动。他对近世宗教、社会、文化、教育的改革，都曾做出伟大的启发和指导。他的《爱弥儿》是构思二十载和撰写三载的不朽之作，在扫除封建教育和建设近代教育的转捩中，无疑是高大的丰碑。有的教育学者说，如今所有的教育原理都被这本书在二百年以前提出了。有的教育学者说，只要柏拉图的《理想国》与卢梭的《爱弥儿》留存在世，纵令其他教育著述被毁，教育园地也是馥郁芬芳的。虽然这些说法难免夸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爱弥儿》的确是十分值得我们研究，从而批判地继承的人类教育遗产。

为着深入理解《爱弥儿》的意义，首先需要理解十八世纪是法国的黑暗时代。那时属于第一等级的天主教僧侣和属于第二等级的封建权贵居于统治地位，横征暴敛，荼毒生灵，路易帝王妄称“朕即国家”，正表明其专制淫威的疯狂膨胀。第三等级包括资本家、工人、市民、农民、知识分子等，是为数众多的被榨取的对象。第三等级中的工商业者虽拥有财富，却无权参政，不能好好发展生产；

市民缺乏政治和法律保障，收入微薄和税捐繁重；农民更是赤贫如洗，生活困窘，以致饥饿成为农村经常的客人。为防止人民觉醒和麻痹群众斗志，天主教从思想意识方面对人民严厉控制，在所谓文明的枷锁下的人心，便死气沉沉，了无生意。这一切把法国弄得疮痍满目，遂使大革命成为历史的必然。启蒙巨子的和卢梭的著作，其中包括《爱弥儿》，都是从思想意识范畴给革命充当开路先锋的。

其次，为着深入理解《爱弥儿》，还须对它的著者有所理解。的确，《爱弥儿》不是寻常的教育著作，而是卢梭这位卓越天才，为彻底改革时弊而长期苦心焦思的结晶；而且正因如此，它也是使卢梭不容于祖国的祸根。这本杰作蕴含着深邃的哲理和沸腾的感情。它对于旧社会、旧制度揭露得淋漓尽致；对于新社会、新教育描绘得使人不胜向往之情。确实如某些文学史家所讲，卢梭的几经挫折的一生充满着辛酸和热泪，只有具有这类不平凡的感受的他才能写成《爱弥儿》这类不朽之作。不理解卢梭的为人，就不可能对此书的实质有较深刻的理解。我们须交待一下卢梭的坎坷生平和他那狂飙式的异常独特的性格。

在千余年的漫长岁月里，欧洲是受基督教统治的。教会僧侣监督人们的言行，管束人们的思想，非一般人所敢违抗。宗教改革爆发于十六世纪，从此新旧教之间进行残酷的倾轧。就法国而论，它是天主教根深蒂固的国家，胡格诺派新教徒受到迫害，双方战争多年。新教徒思想进步，在法国不易存身，卢梭刚好是出生于新教徒之家。不过，他的祖辈为着信仰自由，早于1554年迁居瑞士的日内瓦。卢梭于1712年生于该城。卢梭自幼丧母，由姑母抚养，度过了幸福的童年。他说，在自己的孩童时期，就连皇子也不会比他被人看护得更周到。日内瓦是新教加尔文派的诞生地，是新教徒的乐园。它那特有的钟表业、雕刻业、印刷业，技艺精良，独步欧洲，工商业居民收入丰厚，因而一般都有暇读书求知，享有较高的文化

水平。卢梭的父亲依萨克 (Issac) 以制造钟表业为生, 就因阅读古代希腊、罗马的作品而酷爱自由和爱国成狂。他经常和年仅七岁的儿子卢梭, 深夜讨论古人古事, 使其从小就深受到浪漫的和爱国的情怀的感染, 从童年起就迷恋古希腊普卢塔克所著的《英雄传》。他曾说: “由于这种有趣的阅读, 以及父亲和我关于这本书的讨论, 养成了我那崇尚自由和民主的精神, 养成我那高傲而不受屈辱的性格, 这种性格不能为环境所容, 便是我终身不遇的原因。我头脑中不断为罗马和雅典伟人的思想所盘踞, 我仿佛在和他们为伍一般, 我本身又是共和之邦的公民和爱国狂热的父亲的儿子, 我已为父亲的身教所感召了; 我相信自己就是希腊或罗马的人了; 我已将自己和书中的人物融为一体了; 当我想到那令人神往的伟人杰士的坚忍和无畏时, 不觉间竟双目炯炯而声音雄壮。有一天, 我在桌旁叙述斯开瓦拉 (Scaovola) 的事迹, 在座的人们全都很惊讶地看我走向前去, 把手放在熊熊炉火之上, 来表演这位英雄的动作。”^① 这幼年习性的烙印最深最牢, 对于卢梭向恶势力不屈不挠的强硬性格的形成, 是肯定大有影响的。

这种富有教育意义和充满父爱的家庭未能持久。1722 年, 不甘屈辱的依萨克和军官格斗, 被诬犯伤害罪, 逃往里昂。年仅十岁的卢梭便成了孤儿。他到舅家寄居二年, 住在风景秀丽的波塞 (Bossey)。给他启蒙的教师兰贝塞尔 (Lambercier) 又是性情温良而循循善诱的人。这里的大好风光和欢乐生活, 陶冶了卢梭爱好自然之心, 他希望人人都能享受这种乐境。可以说, 卢梭童年受到的教导是健康的, 所受的思想熏陶是进步的, 这就奠定了他那“归于自然”和讴歌性善的初基。

卢梭的不幸生活始于 1728 年, 时年十六岁。原因是他习雕刻

^① J.J. Rousseau, Confession, Everyman's Library, London, J.M. Dent & Sons Ltd., 1931, Vol. 1, 第 5 页。

业四年，很感爱好，欲学成绝技，但凶恶的师傅横加打罚，迫使卢梭不得不流浪各地。不过，这漂泊生涯给卢梭带来了很大的收获。其一，他于1728年遇到奉天主教之命规劝新教徒改宗旧教的华伦(Waren)夫人，经她感化，卢梭竟由新教改奉旧教。对于新旧教的态度在当时是异常严肃的大事，改宗应该在生命中产生重大变化；不料，卢梭见到旧教的虚妄，对旧教更其厌恶了。其二，他曾到侯爵古温(Gowon)府邸服役，为侯爵记录口语和清抄稿件。他说由此不但学习了纯粹的拉丁文，还领略过许多名著，为他以后自学成才培植了根底。其三，卢梭自幼读书成癖，多次节衣缩食，购书自娱，和华伦夫人由热恋而同居于前默特(Charmettes)时，更发奋勤学。当时哲学、文学、科学的名作都是他所浏览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和英国哲学家洛克的名著，几乎都被卢梭读过。耶稣会是天主教保守派，很多新颖著作都遭它查禁，但卢梭猎奇笃学，连新教冉森派(Port Royalists)教士的论著也读了。他还曾阅读新教圣乐会派(Oratorio)的论文。与此同时，卢梭又自修了几何学、代数学、历史、地理、天文学、生理学、解剖学等科学知识。他自称虽在百忙之中，口中也诵读不辍。其四，卢梭结交了一些学者，最重要的是伏尔泰、狄德罗和孔狄雅克。狄德罗是百科全书派的首脑，卢梭在巴黎和他过往甚密，受到进步思想的启迪，并且参加了百科全书的撰写工作，随而成为启蒙运动旗手。其五，卢梭阅读洛克的《教育漫话》后，有志以教育工作为终身的职业。1740年，他漂泊里昂，果然做了孔狄雅克之弟马布里的家庭教师，教授马布里的二子。虽则不足一年即以失败告终，却引起卢梭对于教育问题的浓厚兴趣，从此观察思考，遂于1762年著成《爱弥儿》。最后，卢梭在这二十年流浪的途中，有着一般人所没有的特殊感受。他在瑞士、法国等地，曾目睹暴君及其爪牙强凌弱、众暴寡、横行霸道、苛政猛于虎的情况。他蓬踪各地时，曾以出售编写的乐章

为生，曾任法国驻意大利、威尼斯公使的随员，也曾迫于生计而充任过杂役，当过盗窃偷儿。这种底层社会小市民的遭遇最受人鄙视，使他对封建压迫知之最切，恨之最深。因此种种，他愤世嫉俗，疾恶如仇，非挺身而出不成。一个非凡的天才偏偏受到百般的磨难，他那无法抑制的革命激情，自然而然地会喷放出火山般的熔焰了。

1749年是卢梭生平中又一个重大的转换点。他已三十七岁，处于峥嵘的年华。如果说前一时期的能力储备时期，这时便是他旺盛的著述时期。是年第戎(Dijon)学院征文，题目是《科学和艺术的发达对于道德的影响》。卢梭的论文被评为第一。他说古代希腊、罗马都是因道德堕落才灭亡的；而文化发展乃是它们道德腐败的原因。他又抨击在当前的社会中，科学、艺术无法使人开拓和创新；只能叫人成为传统的奴隶。“在艺术陶范我们的行为和引导我们矫情文饰以前，我们的道德是朴素而自然的；我们所有的行为和方式，在最初便宣告我们的爱好有种种的不同。但是到如今，那种更为烦琐的习俗和尽情雕琢的做人趣味，已经使得这种快人的艺术，成为僵化之物；因之，在现在的做人态度中，便流行着一种奴性而虚伪的呆板划一了。我们可以说，每个人的心灵都被用同一种模子来陶铸成为同一的样式了；至于我们自己天性的指引，我们却是绝不理睬的。”^①又说：“艺术、文学和科学把人们最初的自由的感觉给摧毁了，而人乃是为这种自由而生的；它们使人们安于奴隶状态，以便成为所谓文明民族。我们心灵的破败，正和艺术和科学的进步，成为正的比例。”^②“欧洲已经退化到远古的野蛮主义了；欧洲人民在现在可谓极为文明，却在几个世纪以前，早就

① J.J.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 London, J.M.Dent & Sons Ltd., Everyman's Library, 1930, 第132页。

② 同上，第133页。

沉溺于一种比愚昧更坏的情况之中了。”^①卢梭打响了反封建文化的第一炮。

五年后即1753年，第戎学院再次征文，卢梭以《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应征，不幸落选。实际上，在卢梭所有的著作中，狄德罗最欣赏这篇。这绝非廉价的称誉。论文说在原始社会中，人人是自由而平等的。忽然一个强人用木桩圈起一片土地，硬说这是他的私产，恰好众多质朴的人承认了，从此便结束了太平岁月，跨入所谓文明社会。接踵而至的乃是掠夺财富和与之伴随的恐怖，杀戮、战争和危难。假如当初人们拔掉那霸占土地的界桩而不予承认，人们便仍将陶醉在伊甸园内。卢梭在文中已经以很形象的说法道破私有制是文明社会，实际即阶级社会的根源，在认识上超过一般启蒙学者的水平。

在这时，卢梭名声远扬是一宗大事；他厌弃天主教而改奉新教，并因此得以重返日内瓦，是另一宗大事。后来他定居巴黎市郊孟特莫尔（Montmorency）幽静的森林别墅，专力著述。他于1759年问世的《新哀露易斯》，于1762年问世的《民约论》和《爱弥儿》，都富有火药气息，是轰击旧社会、旧家庭、旧教会、旧文化和旧教育的重型武器，大大地发人之聋和振人之聩。《新哀露易斯》借出身门第破坏爱情结合的悲剧，反对封建婚姻制度。《民约论》反对封建政治，威力更强。它论证人类本是自由幸福的，后来为维护公共秩序，众人才制定契约，组成社会；官吏原是受命于民而为民办事的。怎奈后来执政者竟以权谋私而跋扈虐民了。该书开宗明义道：“人是生而自由的，却到处受着约束。”^②又说：“专制政体并不是统治

① J.J.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 London, J.M.Dent & Sons Ltd., Everyman's Library, 1930, 第130页。

② 同上，第5页。

人民使他们幸福，乃是使人民贫困以便于统治他们。”^①又说：“诸君请牢记，城墙是由拆毁的乡村屋舍建造的。我每逢遇到一所矗立城中的宫廷，就联想到全部乡村都变得荒凉了。”^②对这种害民之徒自应予以罢免、废黜和绞杀。《民约论》和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大唱反调，有“革命圣经”的美名。《爱弥儿》是向封建教育挑战。它鼓吹天性善良，而封建教育矫揉造作，人们才失去本然之善。因此，它呼吁率性发展，“归于自然”。就是说，卢梭对于封建社会作了多方面的进攻，其威力是无穷的。他使人们感觉封建堡垒这座冰山，即将在强烈的阳光下溶解消失了。

最不幸的是年已五十岁的卢梭，正当他在思想界掀起巨澜而受到众人敬仰的时刻，又开始了流放生涯。缘由是《爱弥儿》于1762年刚问世，巴黎国会随即决议惩处作者，天主教会更焚毁了这本揭露宗教迷妄的名著，卢梭为形势所迫，逃奔瑞士。不料，他的第二故乡同巴黎一样地焚烧《爱弥儿》和搜捕作者。他说：“巴黎和日内瓦惩戒我的命令，给予全欧以唆使，叫他们都以空前的暴戾来作厌弃我的呼声。所有报章、杂志、书册都发出了最可怕的警告。特别是法国，那些文雅、客气而慷慨的法国人，他们素日以优美的修养和尊敬不幸者自豪，如今顿然忘记了这些美德，竞相以辱我之频和侮我之甚为能事。我被他们称为异教徒、无神论者、癡汉、疯人、野兽、豺狼……。总之，巴黎人无论发表什么著作，假如不曾诽谤我，就似乎怀有将与警察冲突的戒心。”^③

卢梭不能在瑞士存身，便奔往普鲁士邦。纽卡太(Neuchatel)地区的总督曾给他以立足之地；英国哲学家休谟更邀他寄寓英伦。

① J.J.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 London, J.M.Dent & Sons Ltd., Everyman's Library, 1930, 第69页。

② 同上，第81页。

③ J.J.Rousseau, *Confession*, Vol. 2, 第230页。

普王腓特烈二世和英王乔治三世，还先后趁机拉拢这个受难的文人。卢梭一一拒绝了。马克思曾为此而高度评价卢梭的明智。卢梭经五年奔波异邦的风霜，于1767年潜返法国，隐遁在风光明媚的尔蒙南村(Ermenonville)，法国政府也于1770年对卢梭发布了赦罪令。一些愚顽的权贵和僧侣虽不断唾骂卢梭，但与日俱增的卢梭的崇拜者，却愈加敬重这位老而弥坚的真理卫士。科西嘉和波兰当局都敦请卢梭给他们制定复兴规划。和卢梭素不相识的思想先进之士，也不惜长途跋涉来瞻仰这垂暮的大著作家、大思想家，使得这个隐遁的老人显示着他的迫害者所没有的吸引力。卢梭的晚景毕竟是凄凉的，终于患迫害狂，于1778年逝世。

恩格斯论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说，它是“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①就法国而言，大革命前后也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卢梭出色地完成了动员革命群众的神圣使命，是当之无愧的巨人。为理解卢梭的巨人形象，在叙述其非凡的生平之后，必须谈谈卢梭那种迥异寻常的独特风格。

卢梭在《忏悔录》中说：“我正在着手一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工作。我希望在人类之前放置一个绝对自然的人，这个人就是我。”^②又说：“这个绝对自然的人只有我一人而已。”^③有人说，卢梭虽在物质生活上是贫穷的人，却有着非常丰富的精神财富。这个判断很有助于理解卢梭这个自然人的特性。我们且进入卢梭的灵魂深处，看看他的精神境界。

这里请看卢梭的自我评价。他说：“我承认我信以为真的为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45页。

② J. J. Rousseau, *Confession*, Vol. 1, 第1页。

③ 同上，第20页。

理，而不承认错误的为真理。”^① 在那庸陋之辈随俗浮沉的年代，卢梭是多么光明磊落而气概非凡！卢梭还说：“我认为没有任何事情比之成为自由和道德的人，是更为伟大而优美的，这些事乃是不为财富的考量和流俗的认识所绳，完全不依恃他物而自存的。”^② 他之不逢迎君上去乞讨荣禄，他之不迎合时尚去骗取虚誉，乃是必然的。卢梭是著作家。他的著作态度就最为严谨。他说：“我永远觉得著作家的地位不是，并且不能是，显赫而受人羡慕的，除非他不把著作视为职业才能办到。人若只为了生计而思想时，那便难以产生高尚的思想了。他若想能够并且勇于倡导伟大的真理，他必须不仰赖其著作之成功。我把著作投向群众，清楚地意识到是为着人类的福利而说过话了；除此之外，则我毫无萦怀。假若我的著作不受世人欢迎，那些不想享受它的利益的人乃是更为倒霉的。至于我个人，我并不靠人们的恭维来维持生计；纵令我的书不曾销售，我的职业依旧能够维持我的生活。正因如此，我的书反而得以畅销了。”^③ 他直言不讳地戳穿时弊，他之不计得失地吼出时代的强音，不只由于他具有真知灼见，还因为大智者必有大勇。

在此更需理解的是：自然人并非回到山林的遁世派或厌世派；卢梭乃是大无畏的社会改革家。他之痛斥旧社会和鄙弃旧文化，他之提出全新的是非观念和爱憎感情，正表明他在渴求自由平等而尊崇人性的新国家、新文明。他不是要做与世隔绝而孤立生存的鲁滨逊，而是要充当目光远大而感情充沛的入世派和革新者。他的著作之不同凡响，正因为它们恰是卢梭血泪的结晶。如果用革命导师的评语，那就更恰当了。马克思说：卢梭“不断避免向现

① J.J.Rousseau, *Confession*, Vol.1, 第3页。

② J.J.Rousseau, *Confession*, Vol.2, 第7页。

③ J.J.Rousseau, *Confession*, Vol.2, 第53页。

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①所谓绝对的自然人应该是彻底反封建者的同义语了。

我们为了理解卢梭之不平凡，还应把他和其他启蒙运动者略作比较。卢梭出身于小手工业者的家庭，别人则多出身资产阶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卢梭曾饱尝底层社会给予他的痛苦。这使卢梭除去一般地反封建以外，更清楚地认识到私有财产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卢梭于1775年在所撰《论政治经济学》中曾说：“一个首应注意却从来无人过问的关系，就是每个人从社会组织中所得到的利益。它给富人所有的巨额财产以强有力的保障，而几乎弄得穷人不能安保他们亲手搭起的草屋。难道社会的一切利益不都给豪强和富人占有了吗？难道全部肥缺不都落到他们头上了吗？难道免税的特权和优惠不都是只由他们享受了吗？难道政府不总是袒护他们吗？……穷人的遭遇同贵族相比是多么不同！人类愈多得到穷人的好处，就愈少让他们享受权利。所有一切的门对穷人都是关闭的，甚至当他们有权打开这些门时，如果穷人偶尔要求公正待遇，那就比另一种人取得恩宠更为艰难费力。”接着，卢梭又说：“这两个阶级的人之间的社会契约条款，可以概括为：你需要我，因为我富而你穷。那么，我们就来订立条约。我给你替我服务的光荣，条件是你把所剩下的那点东西都交给我，作为我指挥你劳动的报酬。”^②卢梭在此不但作了深刻的阶级分析，而且恰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他还接触到剩余价值的课题了。

更为可贵的是，卢梭除一般地反封建外，还明确地提出“民为贵”的主张。他在《民约论》中，大反“君权神授”和“君重民轻”的传统谬论。原因是人民相约组成社会，是“民为主”的，君主乃是“作为国家中的行政权利的受委托者而考虑的。”无奈，“已经成为世袭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48页。

② 卢梭：《论政治经济学》，王运成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4—36页。

首领们，逐渐习惯于把官府看作自己的家产，把自己看成是国家的所有主，而起初他们只不过是国家的官吏。这样，他们也就习惯于把自己的同胞叫做奴隶，把这些奴隶当作牲畜一样计算在他们的财产数目之内，而他们自称是与神齐等的王中之王。”^①其结果是“暴君剥夺臣民算是公正。暴君让人民活着算是施恩。”^②卢梭说，根据人民制定的契约，官吏乃是为人民效劳的，他们损害人民就是背叛契约，人民就有权抛弃他们而恢复天赋的自由。就是说：“当人民不得不服从时，他们服从了，他们做得对；一旦人民可以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他们打破它，他们就做得更对。”^③这又是多么响亮的革命号角！

同样由于上述原因，卢梭还特别热切地推崇人民的地位。他说：“人民才是人类，不属于人民范畴的人为数极少，不值得计算在内。大多数人所属的等级最为尊贵。”^④又说：“必须尊重你的同类；必须牢记人类所包括的主要是人数众多的人。一旦帝王和哲学家统治在世界消灭，人民并无损失，地球是照样运转而无缺欠的。”^⑤相反，卢梭咒骂统治者是刽子手、吸血鬼、豺狼、恶棍，必须铲除而后快。俄国十九世纪民主主义者赫尔岑曾说，卢梭比其他启蒙运动者具有更深刻的民主性和反封建的不妥协性，是有道理的。

另一方面，卢梭的阶级局限性也极为明显。他以小资产阶级的眼光，展望革命后的世界，把日内瓦型的小国寡民而又无巨富、

①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法律出版社1958年版，第141页。

② 同上，第135页。

③ 卢梭：《民约论》，何兆武译，法律出版社1958年版，第6页。

④ J.J. Rousseau, Emile, Everyman's Library, London, J.M. Dent & Sons Ltd., 1933, 第186页。

⑤ 同上，第187页。

无赤贫的社会，悬为理想。按照他视私有财产为社会不平等的起源的理论，理应主张废除私有制，但他在这里是自相矛盾的。所以，他和当时的激进派即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还有，卢梭和资产阶级大量发展工商业的要求，同样南辕北辙。小资产阶级虽然比资产阶级受压迫更重，要求解放的心情更切，因而革命的思想更坚决；但卢梭式的温饱思想，和当时资本主义打碎地方割据，振兴规模宏大和技术新颖的生产事业的客观存在，相去更远。所以法国大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

再则，作为卢梭讴歌自然人的理论基础的是性善论。他反对天主教的原罪论，认为人的天性善良无邪，把率性成长和“归于自然”视为天经地义。自然人就是这种理想的具体化。实际上，天性只是人类发展的潜能，它在合理的环境中，可以向善的方向发展而成为善；反之，在不合理的环境中，也可向恶的方向发展而陷于恶。笼统地肯定性善是不科学的。与此相关，叫人不受社会制约而率性成长，借以“归于自然”，也是形而上学。因为这纯然是不切实际的冥思玄想。实际上，被卢梭称道的得自上帝恩赐的自由、良心和理性，乃是资产阶级发展政治经济所需要的品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得好：“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①

卢梭在其阶级局限性以外，还有其哲学局限性。他和狄德罗等唯物论者不同，是唯心主义思想家。他之与启蒙学者决裂根源于此。他的性善论以上已加分析。他那把社会视为人们订立契约所形成的理论，他那解放天性“归于自然”就可拯救社会的学说，同样是不符合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这更无待赘言了。

卢梭纵然有着这种那种的局限，在当时却因其强烈的革命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7页。

思想感情，再加上他那论证的辩才和文学的素养，便发挥了非一般人所能发挥的鼓舞群众扫荡封建社会的力量。这个绝对的自然人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确是恩格斯所称赞的“非常革命的”、“为革命而开导人们头脑的巨人”。当然，这样的巨人才能在教育领域作出一般人所难以作出的伟大预言。《爱弥儿》经这样非常革命的巨人的二十年构思和三年撰写，当然会发出震惊世界的巨响了。

(二)

在卢梭的著作中，《爱弥儿》、《民约论》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最为杰出。离开当时的时势，是无法理解这一点的。用素描的手法说，那时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是路易帝王的君权和天主教会的神权。启蒙运动者梅叶说，政府和教会是朋比为奸而危害人民的匪徒，他的说法是千真万确的。《民约论》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锋芒，直接指向君权。《爱弥儿》讨论教育问题，由于教育从来就是教会的世袭领地，也就指向了神权。《爱弥儿》出版后教会立即下令焚烧，唾骂卢梭是无神论者和上帝的敌人，正表明它对神权的威胁是严重的。所以，《爱弥儿》不是在宁静的课堂讲论的教育学，而是战书。我们必须从革命的形势来认识它。至于卢梭积年累岁地探索教育课题长达廿载而著成此书，那更不是偶然的。

启蒙运动家是社会改造家。他们的信念是“意见统治一切”，把启发理性视为救世的关键。恩格斯形容当时的形势说：“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其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①原来中世纪是崇尚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04页。

仰的时代,近代是崇信理性的时代。启蒙运动者认为,信仰与理性对立,犹如黑暗和光明、愚昧和启蒙之对立一般,遂以解放理性为旗帜。启蒙学者还认为人本来是自由平等而率性发展的,君主专制是压迫天性的,尊重人性和压制人性是矛盾的,遂又要求推翻封建政权而解放天性。实际上,理性与天性乃是一回事。要求解放理性和解放天性,在实质上,都是为着资产阶级取代封建统治。由于当时并不流行以暴力夺取政权的理解,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认识,更不存在。一种合于逻辑的推论,便是坚信教育在改造社会方面的效能。

以法国的爱尔维修为例。他认为人的理性和知识得自后天的教育,天才乃是教育的创造物;还认为人人智力平等,人人都能蒙受教育的效益,因而呐喊“教育万能”。以狄德罗为例,他非教育万能论者,但相信教育对于人格和素质的形成具有陶铸作用,邪恶乃是腐败教育和黑暗政治所造成。他呼吁国家广兴学校,启发民智,反对僧侣主义和贵族垄断教育。以孔狄雅克为例。他以英国的经验主义为根据,认为儿童早年教育要以启发理性代替诵背经典,以实物观察取代文字讲读,大力提倡教育改造。在当时,不仅启蒙学者如此,法国的傅立叶、圣西门和英国的欧文之成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就因他们不想采用暴力手段,幻想和平地实现理想社会。1762年,稍后于《爱弥儿》而在法国问世的拉·夏洛太著的《论国民教育》,同样阐述教育是立国之基。再则,当时学者不仅在思想理论上鼓吹教育的重要性,卢梭还于1772年,为被俄、普、奥三国瓜分的波兰,制定了兴学复国的规划;狄德罗也曾于1773年,为俄皇卡捷琳娜二世制定了兴办学校的规划。不妨说,在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可以说在欧洲某些国家,掀起了一股教育热。

若再回溯一下法国的历史,学者早在十六世纪已经感到改革贻害青年的传统教育的急迫性。拉伯雷所著《卡冈都亚和庞大固

埃》，就对当时经院教育百般嘲讽，并描绘出新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方式的蓝图。他还反对中世纪以来的原罪论和提倡性善的学说。稍后，蒙旦写了《论学究气》等杂文，也认为人的天性善良，驳斥了原罪论。他还认为封建教育腐败无能和教条主义压制理性。他提倡学以致用和发展理智，极力反对造就愚陋庸鄙的学究，要培养精通世故的士绅。拉伯雷和蒙旦显然作了卢梭的先行者。

历史洪流和时代脉搏带给革命巨人卢梭的重大使命，是考虑怎样砸烂旧教育而为新社会培养新人。《爱弥儿》序言说得清楚：“尽管有些人著书立说，其目的，据说是完全为了有益人群，然而在所有一切有益人类的事业中，首要的一件，即教育人的事业，却被人忽视了。”^①在卢梭的前辈和同时代的人中，既已有了上述教育论著，卢梭为什么还嫌教育被忽视了呢？其一，因为别的书所要求的改革并不彻底，而《爱弥儿》显然不同。卢梭对读者说：请牢记我们已经确定的条件，假如你只是一个迂腐的人，我这本书就不值得你阅读了。其二，因为别的书谈论教育时谈论得不全面、不系统，破坏性多于建设性。卢梭说：“很早以来就有人在大声反对这种旧有的教育方法了。可是从来没有人准备提出一套更好的来。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和科学，倾向于破坏的成分多，倾向于建设的成分少。人们可以用师长的口吻提出非难；至于说到建设，那就需要采取另外一种口气了，然而这种口气，高傲的哲学家是不太喜欢的。”^②再明白不过，《爱弥儿》不只是竭力揭穿旧教育的失败，而且积极提出成套的而不是零星片断的建设新教育的方案。卢梭还以战斗的笔锋来宣扬他的新教育思想，其影响就非他人所及了。

举例来说，狄德罗和爱尔维修等虽采用了唯物主义哲学观点，但他们的教育论著在理论深度、内容广泛程度以及战斗威力方面，

① 卢梭：《爱弥儿》见本书上卷第29页。

② 同上。